



■新作聚焦 艾伟长篇小说《盛夏》： 探寻生命的“明”与“暗”

□杨倩

在长篇小说《盛夏》中,作家艾伟以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支点呈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书写知识分子、平民百姓的人生际遇,并将目光投向人性的隐秘幽深处,探究人的罪孽意识与生命出路。

故事开场,盛夏时节的“永城”浸泡在阳光之海中,“街头的建筑仿佛被光融化了似的微微颤动”,“连植物都被阳光浸透了似的,显得饱满肥厚”。天桥下“申冤有理,此路不通”的字牌堵住了车流,人群陷入焦灼。“盛夏”以其特有的明媚、炙热、敞亮笼罩着整座城市,而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秘密、黑夜中发生的意外,也似乎在静待着光芒的照耀,或许随时就会重见天日。故事的发生地“永城”谐音“甬城”,小说中的“西门街”“南塘街”等街道确实化用了宁波城的街巷名称。但在《盛夏》中,艾伟并没有选择复刻城市面貌和历史事件,也无意于为书中的“永城”赋予强烈的地方特质,反而对一些具有现实依托的地点和事件点到为止、淡化处理。如此一来,城市背景倒也自成一派,虚实之间的种种设定也值得推敲、耐人寻味。

在这座燥热的南方之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进着。小说由三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构成:小晖、丁家明和柯译予之间的情感纠葛线、警察丁成来探寻真相的调查线、工会主席王培庆和小偷冯英杰、赵龙的复仇线。新仇旧恨穿针引线,将这三条线串联起来,而不同人物的命运也因此交汇、重合。

《盛夏》中的每一个人物的背负着难以言说的罪孽和负疚感前行,即使最无辜的受害者也是如此,天真与残忍、明朗与忧愁、正义与邪恶的复杂特质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共存。原本单纯明朗的男孩丁家明在遭遇意外车祸后以“废物”自居,父亲和女友的关怀照料对他而言成了煎熬和罪过,于是他选择不断伤害自己和他人,将痛苦与罪孽无限循环。小说中最典型的忏悔者柯译予身上也具有一些矛盾与复杂:对妻子女儿不顾情面、粗暴残忍,对恋人则进行深情且诗意的神化,面对过往真心忏悔,面对过错却又曲折逃避……创作者采取了不带任何情感倾向的上帝视角展开冷静而克制的叙述,抛却一切偏见与偏爱,不对人物进行任何判断,尊重故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选择与成长变化,人物身上的理智与情感、放纵与悔悟都自然流淌。其怜悯与关怀不聚焦于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普遍的人生。随着情节的推移,叙事视角也在不同人物之间切换,给读者留下旁观的余地和审视的空间。

小说《盛夏》融合了悬疑、罪案和心理等不同元素,两桩案件引发了种种恩怨纠葛: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受害人丁家明双腿瘫痪,失去生活的信心;农药厂宿舍案激发了王培庆申冤情绪,警察丁成来和律师柯译予由此卷入调解案之中。但相比于案件之“罪”,心灵之“罪”更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警察丁成来在儿子遭遇车祸后心存愧疚,猜测这场意外源于自己职业生涯中结下的仇怨,于是深觉对儿子有“罪”;律师柯译予面对女儿的叛逆不知所措,每当回忆起自己对女儿的言语伤害,都深觉有“罪”;小晖在男友遭遇意外后内心饱受折磨,认为是自己的任性出轨导致了这场悲剧……促使他们为过往之“罪”买单的并非悲剧本身,而是自我内心深处的隐忧与责任。实际上,对于过往的忏悔、对于出路的渴求一直埋藏在这些人物的心底,其良知和温情也从未被泯灭,

只是生活的洪流常常会使人置身其中,忘却了反省。

在对“罪”的追问之下,《盛夏》关注当下的时代经验与生命体验,尤其细致入微地呈现现代人“生命的挫败感和灵魂的混乱迷失”。柯译予的抑郁难眠、焦虑不安,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病的缩影。在向通灵“大师”寻求解答时,他难以袒露自身罪过,顾左右而言他,通灵“大师”立即拆穿了他的谎言:“你的病根在于你放不下,因为你太傲慢了。”他在惊愕中对眼前的“大师”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柯译予深知“大师”名号往往具有夸大和神化的成分,反而对各种“大师”“大V”的盲目听信和膜拜,实则是内心缺乏理智和信仰的体现。“大师”也无法将柯译予从精神上的煎熬中解救出来,内心的宁静终究需要依靠自我认同与自我包容来构建。

借助爱恨纠葛、儿女情长的故事外壳,艾伟真正关注的是人的良知与渴望,是负疚感深处的善良与希望。网络平台和社会热点事件为《盛夏》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艾伟在书写中也融入了他个人自2011年起使用微博的经验和感悟。书中的柯译予深谙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他认为网络有时会沦为“喂养”仇恨、煽动情绪、攫取利益的工具。因此,在社交网络上的“仗义执言”,也只是其工作策略之一。但柯译予同时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微博控”,长期在网上处于高亢状态,生死攸关之际也不忘使用微博进行记录。同时,网络信息的过载,也加重了他的心绪不宁。当他发现自己周遭身无一人,不可言说的罪恶感逐渐将他吞没,精神崩溃之际,网络反成为他唯一的情感宣泄口,用以安置他那份强烈的忏悔意识与自我关注。在告别永城时,柯译予在微博上留下忏悔的诗句——“一个罪人的厌倦比绝望更绝望”。这份厌倦中包含着他的自我厌弃,也包含着人在网络世界潜伏的百无聊赖、百般寂寞之感。此外,书中的一些设定颇具寓意,隐约折射着现实世界。网络上铺天盖地、不顾事实的声音让执行公务的警察丁成来喘不过气来。无辜者或被“人肉”被无端谴责,或被拍到神坛接受追捧,都只在瞬息之间。如果真相能被轻易地颠覆、遗忘,那么世俗所贴出的功德与罪恶的标签便也不再可信,唯有个人的良知能够真正审判罪孽,但人心却是最难以监测和控制。这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追问:有罪之人是否意识到了自身的罪恶并为之忏悔?他又能否处理好内心的忏悔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无论复仇还是原谅,直面还是逃避,人们最终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偿还和赎罪。透过《盛夏》观望不同人的忏悔和抉择时,我们也不禁要思考:究竟何种形式的赎罪更为合理?对于法律规定和道德标准约束之外的过错和伤害,又该怎样处置?艾伟并没有直面回答。不同人物的选择过程,正是探寻心灵深处善良与希望的过程。在最初创作设定里,忏悔者柯译予本会因为难以承受的自疚感而选择自我毁灭,但作者最终选择留下开放式结局。当柯译予驱车前往一片无人山谷,“阳光洒满了整个谷地,掩映在植物丛中的河流流出某种深邃的黑暗”,选择远离尘世的路径,是对功名利禄、虚伪假面的告别。普照的光明与“深邃的黑暗”共存,生命的“明”与“暗”也是如此。由衷的忏悔和改过并不能使过往的罪孽一笔勾销,但生命却因此得以净化、延续。

■关注



看见无数的她,也看见她的「无数」

□曹译

近日,批评家、学者张莉的《我看见无数的她》出版,该书以女性视角解读文艺作品,与读者一起走进文学和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诚如书名所言,该书聚焦种种不同特质的女性,让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她。她们形象丰富、多姿多彩,共同搭建起认识女性形象的广阔视野。与此同时,从《我看见无数的她》中,我不仅看到了“无数的”女性,更看到了女性的“无数”,看到了女性的复杂。

重读《我看见无数的她》时,我正在看一部国产女性向言情剧。该剧塑造了各种“美好”的女性形象,让身为观众的我觉得很“爽”——我知道这部剧在“迎合”女性观众,也知道这意味着女性观众影响了电视剧的价值塑造,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但同时,我不禁产生恍惚之感,现实生活中,女性果真如此“完美无暇”吗?换句话说,文艺作品只应塑造“完美”的女性形象吗?

读完《我看见无数的她》,我得到了答案。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展现真实的女性,而不是展现神话后的女性。内在里,女性具有无数性、复杂性。真实的女性身上充满矛盾、暧昧和犹疑,她不一定那么美好,但她努力挣脱束缚,成为自己。女性的“美好”恰恰在于“在成长中自我淘洗”,克服那些矛盾,焕发主体性的光泽。

还记得《青衣》中的筱燕秋,张莉认为,她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身上既有中年女性的种种尴尬,也同时保留着对精神世界的向往。读《青衣》,读者之所以有感而发,首先是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足够真实可信的女性形象。筱燕秋身上负载了中年女性的各种困境,“年华流逝、肥胖、流产之痛……”等等,她不是一个全然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有作为凡人的种种缺陷:“嫉妒、尖锐、薄凉、虚荣”,“她是复杂而矛盾的人”,但正是她的复杂让读者信任,进而观照自身。在文章中,张莉写道,筱燕秋的心理“不只是关于女人的悲剧,尽管怀孕、流产属于女人的生理特征。可是,在人生的舞台上,并不只有女人会遇到前辈/后生的压力、疾病的困扰,遇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遇到一个人的双重生活困境——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巨大缝隙和分裂,遇到人终级的生存境遇的困扰”。也就是说,《青衣》塑造的女性形象显示了足够的复杂,因而该形象深入人心,让人想到自己,接着从小说中获得陪伴和坚持的能量——像筱燕秋那样,即使人到中年,也不向困境低头。

池莉的《不谈爱情》塑造了一个“撒泼打滚”的女性,但正是因为作者这种不留情面的写法,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张莉指出,在《不谈爱情》中,当婚姻出现问题,妻子只会选择哭闹、离家出走等方式要求重视。而丈夫呢,丈夫只想解决“麻烦”,好不再阻碍他的前程。可以说,在整个小说中,丈夫和妻子共同搭建出了一种阶级关系——妻子只用“弱者的逻辑”进行维权,丈夫也只用“解决麻烦”以不妨碍自己的思维处理矛盾,妻子是“第二性”的。这现象其实说明了当下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让女性除了“撒泼打滚”没有更多的维权方式,让男性无法意识到女性的主体地位,并予以尊重。《不谈爱情》虽然没有塑造一个坚强勇敢、自信自立的女性形象,但它是一篇优秀的小说,它揭示了生活的真相,也留下了生活的启示。

类似的形象还出现在《革命之路》中,当弹幕上的观众对爱波为何如此“作”表示不理解时,张莉却谈到爱波所处的50年代的空间。她指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爱波想像娜拉那样走出何其艰难,她没有反抗的途径和方式。她只能以今天看来决绝的方式——自己在家做流产,来完成她的反抗。在文章最后,张莉写道,爱波的“激烈反抗”,让我们看到了“每一次女性解放,哪怕是一个微小进步,里边都掺杂着很多低微的、无声的女性的哭泣,甚至是鲜血”。总之,张莉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空间中女性的为难道和困境,这应该是当代读者“同情地理解”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方式。

此外,在书中,张莉有数次谈到当代读者的问题,认为今天年轻一代很像歌娜(娜拉)里的青年娜拉,我们对很多选择不理解,对很多情况无所谓。这让我想到,《我看见无数的她》也正在让我们直视自己身上的犹疑和尴尬。我们身上不免有偏狭,有对不同女性的不宽容和不理解,这本书启示我们反观自身,要以更“无数”的眼光看待女性,看待女性。

直视自身以外,这本书也以强大的能量给予我们启示。《立春》里的王彩玲让我感动,她遇到许多的困难,经历过许多的犹疑,但她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虚荣,也一直坚强地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她有原则,有追求,最终也不与生活和解、不被生活打倒”。我也特别喜欢书里提到的波伏瓦。张莉写波伏瓦的那段话让我深有感触,她说波伏瓦是慢慢成为她自己的,有一个过程。她在20岁、30岁、50岁、70岁时,对女性和男女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同,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到晚年时候承认了。她在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打开自己,最终成为强大的自己。

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内在都有复杂性。看到女性的“无数”,意味着看到真实的女性,而非神话的女性。女性从想象中落地成人,让我们直面社会困境、直面自身,并坚强地成为女性自己。

■新作快评

张学东中篇小说《弯道超车》,《当代》2022年第4期

高校体制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双重沉思

□王春林

一部以高校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中篇小说,之所以要被命名为“弯道超车”,主要与小说开头处那一场车祸的细节紧密相关。开篇伊始,主人公西北某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奚鸣久自驾车,携自己的研究生魏丽娜,从省城去某地级市的一所专科学校参加活动。由于急于赶路,行车途中,路遇一个较大的弯道,奚鸣久试图强行弯道超车,不料前后两车操作不当,结果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亏得损伤不大,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行程。张学东从这样一场不期而遇的车祸出发,进而对高校体制和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思考与观察。

奚鸣久算得上是一位相对成功的高校教授,却仍然躲不过来自于工作和生活的困扰。具体来说,奚鸣久面临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家庭。儿子刚刚参加完高考,成绩不够理想,只是刚刚达到了二本线。为了能够让儿子上一个相对理想的大学,在奚鸣久眼里一贯庸俗不堪的妻子赵婉,又总是在不停地唠叨折磨。更严重的困扰来自于工作。那一次和魏丽娜一起去参加活动,奚鸣久不胜酒力,魏丽娜遂在他的房间照顾,谁知遇到一个深夜前来造访的不速之客。这个拥有一张橘子皮一样的脸庞的男人,在送上一袋土特产的同时,也送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希望能够在奚鸣久的帮助下在学刊上发表。因为日常事务太过繁忙,奚鸣久把这件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橘子皮脸男人竟然以魏丽娜深夜待在老师房间里提出诬陷,奚鸣久因此进一步联想到现行高校体制的相关弊端:“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卑鄙的家伙居然想耍一个无辜的大学生来逼他就范,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能理解也无法想象。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埋下头去专心致志撰写学术论文,同时,又可以挖空心思不惜使用任何一种卑劣的手段,试图寻找一条所谓的捷径,只为让自己的论文得以快速发表,为此便可以同顾知识分子的品行和操守。这应该就是他执教二十年来,头一次遇到这么龌龊透顶的事情。”事实上,不得不

承认,奚鸣久所指出的这样一种不堪情形,在日益世俗化了的当代中国高校的确是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现行高校体制的不尽合理。正因为中国高校随处可见各种“弯道超车”的急功近利现实,所以,奚鸣久那篇《人文学科不应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的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中提到的,“一旦功利主义的色彩,涂满了人文学科领域的每一面墙壁上,我们的所有研究不过是在趋名逐利,未来,它将给整个学科领域乃至社会注入一种懒洋洋混生活的精神毒剂”这一中心论点,更是犀利尖锐地直指当下时代中国高校一种普遍的弊端。

但请注意,在对高校体制的弊端进行深切批判的同时,张学东更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包括奚鸣久在内的那些长期生活于高校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个文章虽然写得不错却在发表路径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橘子皮脸男人自不必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奚鸣久这样曾经一度自命清高的教授、学者们,他们也在不自觉地精神堕落。关键还在于,即使是奚鸣久自己,也只有到阑尾炎突然发作被迫躺到病床上的时候,方才对自己不自觉的“精神堕落”状况有所察觉和反省。奚鸣久认识到,“也许,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跟自己并不喜欢的赵婉结合,使他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成功的提速和超车”,使他超越了诸多同事,顺利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称和职位。因此,自己和那位橘子皮脸的男人们之间其实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现在他有什么资格瞧不起那个橘子皮脸男人,人家不过是想发一篇论文,他却横加阻挠上纲上线,此刻担心自己,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无可指摘?他不是完人,或许他曾试图追求完美,但在人生关键几步,他都习惯性地选择抄近道,依附了裙带关系,向权力和欲望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说白了,他不过是高校体制里的一个爬虫,与那些被他鄙视的人本质上并无二致。”接着,奚鸣久

对自己和妻子赵婉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直到这一刻,他才深深意识到,一直以来他对别人的态度总是这样,其实他骨子里就瞧不起赵婉,她作为他的人生伴侣,不过是替他生育儿孙操心操持家务,他从来没有从精神的层面上去看待她和关心她,老婆在他生活中更像一个女佣,而他时常还对她报以冷嘲热讽。”还有在对待自己学生方面,他也明显存在问题:“很多时候,他把研究生也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助手和免费劳工,不停地吩咐他们做这做那,起草论文、整理录音、校对文稿,甚至帮他打理日常琐事,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那些学生的感受……”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奚鸣久清醒地认识到,一贯自命清高的自己,其实也同样是“一个总是追求‘弯道超车’的‘既自我又自私’的知识分子”。关键的问题是,奚鸣久的自我批判却并没有到此为止。等到那个橘子皮脸男人的文章在学刊上发表之后,被一种庞大的生存荒谬感团团包围的奚鸣久更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螳臂当车”这个成语:“继而,他又无比真切地感悟到,这辆战车之所以如此强势不可一世,其实也有他的‘功绩’,二十年来他既是车上的乘客,又是它的驭手,是他们所有人共同铸造了这样的体制战车,而他却不明就里,甚至自不量力地想要抵制它,这未免太可笑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从做了系主任的女婿那天起,他始终被牢牢地绑在这辆车上,如若抵制,首先应该抵制的就是他自己!”说实在话,当张学东把批判的矛头如此犀利地对准奚鸣久的时候,其力度很显然已经达到了如鲁迅先生所言那样一种“挟心自食”的程度。

掩卷沉思,中国高校从根本上说也只是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一部分,高校体制以及生活于其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也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学东的《弯道超车》这部中篇小说那犀利尖锐而又深刻的现实反思,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和低估。